

# 20 世纪以来“夏代怀疑论”驳议\*

王 祁

【提要】 关于夏代是否为信史,乃至夏代是否存在,学术界认识不一。自 20 世纪以来,“夏代怀疑论”有一个从怀疑夏代史料到怀疑夏代存在的发展过程,顾颉刚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陈梦家、杨宽开启了“夏代否定论”,艾兰的“夏代神话说”在“夏代否定论”基础上有所创新,但这些观点或无坚实的史料支持,或有逻辑上的矛盾,均无法证明夏代是不存在的。而且,新出现的史料再次证明,夏不是周人伪造的朝代。

【关键词】 疑古 夏王朝 夏代怀疑论 古史辨 清华简

夏问题研究是当今史学界的热点话题。最近几年,与夏有关的专著、论文多有出现,相关主题学术活动也较为频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成立了夏文化研究中心,可见夏问题的热度。

夏问题之所以依旧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学术问题,一方面是因为目前没有发现夏时期的文字,考古学家也没有确凿证据把“夏”落实到具体的遗址中,“二里头遗址夏都说”只是一种极有可能的观点,而非一个不会被质疑的历史事实;<sup>①</sup>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学术界一直有“文献中的夏史不可信”的观点,甚至怀疑夏代是一个杜撰出来的朝代,此即“夏代怀疑论”。关于后者,多数持“夏代怀疑论”的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夏代是周人所杜撰,周人杜撰夏代的目的是为了建构伐商的合法性。对于这一观点,朱凤瀚在 2003 年有一个较好的回应,他指出“西周早期文献已言及夏,时克商未久,商遗民众多,如果周人生生地造出一个虚构的夏来,用以宣传周代商犹如商代夏,是秉承天命,那么如何能使早已有历史典册的商遗民相信?”<sup>②</sup>朱氏所言,直中要害,本可消解周人杜撰夏代说的逻辑基础,但“夏代怀疑论”或“周人杜撰夏代说”并没有就此消失。即使经过众多学者的反驳,<sup>③</sup>依旧有学者坚持“周人杜撰夏代说”。<sup>④</sup>

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是因为当今的“夏代怀疑论”有一个很重要的学术渊源,就是 20 世纪以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商周农业及其生产组织形式研究”(项目编号:21CZS009)的阶段性成果。

①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文集》第 2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42 页;许宏、刘莉《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文物》2008 年第 1 期;许宏《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南方文物》2015 年第 3 期。

② 朱凤瀚《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此后,朱氏又对此观点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证,参见朱凤瀚《夏文化考古学探索六十年的启示》,《历史研究》2019 年第 1 期。

③ 除了朱凤瀚,沈长云、杜勇、张国硕等学者都有专文反驳“夏代怀疑论”。参见沈长云《夏代是杜撰的吗——与陈淳先生商榷》,《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杜勇《关于历史上是否存在夏朝的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4 期;张国硕:《“周代杜撰夏王朝说”考辨》,《中原文物》2010 年第 3 期;张国硕《论夏王朝存在的依据》,《中国历史文物》2010 年第 4 期。

④ 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2004 年第 4 期;陈淳《科学方法、文明探源与夏代信史之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 年第 3 期;艾兰《对公元前 1920 年积石峡洪水与古代中国洪水传说的初步思考》,《文史哲》2018 年第 1 期;李宏飞《夏商世系探索》,李雪山、郭旭东、郭胜强主编《甲骨学 110 年: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1—340 页。

来的疑古思潮。<sup>①</sup>早在 20 世纪初,就有学者对夏代史料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古史辨运动期间甚至产生了否定夏代存在的观点。当今持“夏代怀疑论”的学者,往往援引早期的“夏代怀疑论”以为论据,若不系统讨论早期“夏代怀疑论”,就无法彻底反驳当今的“夏代怀疑论”。但是,学术界一直没有对“夏代怀疑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反驳,而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早期的“夏代怀疑论”没有依据。即使最近十多年撰写专文反驳“夏代怀疑论”或“周人杜撰夏代说”的几位学者,也多针对当今“夏代怀疑论”,没有系统地讨论早期的“夏代怀疑论”。这自然会为“夏代怀疑论”留有继续存在的空间。

因此,今天依旧有必要系统梳理 20 世纪以来的“夏代怀疑论”,从现有史料出发,检视“夏代怀疑论”是否有合理内核。如果系统检视的结果是之前的“夏代怀疑论”没有史料支撑,“周人杜撰夏代说”自然就不攻自破,以后若有学者再提“夏代怀疑论”或“周人杜撰夏代说”,就需要提交更为坚实的新证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缺乏夏代共时性文献,本文的目标自然不是证明夏代存在,而仅仅是判断“夏代怀疑论”是否信而有征。笔者相信,讨论“夏代怀疑论”,本身就会对夏代是否存在、夏与考古遗址的对应关系等重大问题有所帮助。

## 一、20 世纪初的“夏代史料怀疑论”

学者们的“夏代怀疑论”,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文献中的夏代记载的怀疑,二是对夏代存在的否定。前者可以称为“夏代史料怀疑论”,后者则是典型的“夏代否定论”。从学术史角度看,“夏代怀疑论”有一个明显的从“夏代史料怀疑论”到“夏代否定论”的演变过程。因此,我们需要先讨论“夏代怀疑论”的第一个阶段,即 20 世纪初学术界的“夏代史料怀疑论”。这一怀疑论又可以追溯到清末。

清末是今文经学盛行的时代,公羊学兴起,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其对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政治诉求主导早期历史的解读模式。典型的例子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书。康有为希望为其变法诉求寻找学术上的依据,积极宣扬“孔子改制”的观点,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孔子之前,自然是“上古茫昧无稽考”,“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sup>②</sup>这就明确指出,孔子之前的历史,都是无可稽考的传说,典籍中的记载,并不可真信。这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夏代可疑,但有了可以疑夏的精神。所以,康氏弟子梁启超评曰:“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sup>③</sup>其后,夏曾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提出:“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因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读者各信其所习惯而已,故谓之传疑期。”<sup>④</sup>这明显受到康有为的影响。

早有学者指出,民国时期的古史辨运动,与清末今文经学关系密切。<sup>⑤</sup>这一影响同样体现在胡适身上。<sup>⑥</sup>1917 年,胡适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重编讲义,开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使得学生们“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

① 这一点早有学者指出,参见张国硕《试析“夏王朝否定说”形成的原因》,《华夏考古》2010 年第 4 期;李峰《早期中国研究及其考古学基础——全球化时代的新观察》,张海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59—60 页。

②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 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0 页。

④ 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杨琥编《夏曾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92 页。

⑤ 房德邻《康有为的疑古思想及其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 2 期。

⑥ 赵利栋《胡适与康有为:学术联系的一个初步探讨》,《学术研究》2000 年第 1 期。

能下”。<sup>①</sup>其后不久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正式提出“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 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 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sup>②</sup>这一“怀疑的态度”与康有为“上古茫昧无稽考”颇为相似。

胡适之所以认为“东周以上无史”，<sup>③</sup>归根结底是对早期史料的不相信。他认为“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止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梅賾伪古文，固不用说。即28篇之‘真古文’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价值……我以为《尚书》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sup>④</sup>胡适虽然不相信《尚书》的可信，但他的怀疑没有丝毫的力度，不仅没有举出任何可以证明《今文尚书》“没有信史价值”的证据，且怀疑时使用的逻辑也存在问题。从逻辑上说，《尚书》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书，与《尚书》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其史学意义并不相同。前者自然是说《尚书》不可信，但后者并不排斥《尚书》是夏商周三代的官书，即使只为“歌功颂德”，《尚书》也有其可信的成分存在，不能说完全没有史料的价值。

虽然胡适与康有为的疑古思想都没有多少史料的根据，但相对于康有为的疑古是为了政治诉求，胡适的疑古则是为了重新审查古史，更易让时人接受，故胡适的主张在五四运动之后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一点在顾颉刚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顾颉刚早年颇为信服“东周以上无史”说，他在1920年给其妻殷履安的信中有“自周之前……都不是‘信史’”的表述，<sup>⑤</sup>明确提出东周以前的不可信。1922年，受罗王之学影响的顾氏，认为商代具有可证的史料，属于信史行列，不再强调“东周以上无史”，但依旧把夏代归为传说之列。<sup>⑥</sup>这说明顾氏早年对夏代的认识，属于“疑”多于“信”，没有把夏当作信史。学术界或有一种观点，认为顾氏并不怀疑夏，<sup>⑦</sup>仅就1920年前后的顾氏而言，这一观点并不准确。

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的发掘，以及王国维古史新证的成就，商代不仅被证明存在，而且其部分史料也被证明是可信的，夏史记载的可信性自然有所提高。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对夏的认识有了一定的变化，多次表示夏代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比如，顾氏在《春秋战国史讲义》（1933年）中称“在西周和东周人的记载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周的前边有夏和商二代。他们说话中常提到‘三代’，这就是指的当朝的周和前代的夏商……夏的存在是无可疑的。”<sup>⑧</sup>再如，顾氏与史念海合写的《中国疆域沿革史》（1938年）：“夏代历史虽亦仅凭后世之记载，然由种种方面证明，则知在殷商以前确有一朝代也……禹之传说乃属一种神话性质，不足知夏代政治范围之所在，中夏以先，夏之政治中心似在今山东省，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晚夏则移居河东及伊、洛流域，然东方仍有其子遗也。”<sup>⑨</sup>可见，至迟到20世纪30年代，顾氏有了明确的夏代存在、夏史可证的认识，抛弃了过去的夏代非信史的观点。

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对夏的认识，尚有一个较为矛盾的态度，即一方面相信夏代是真实存在的，另一方面又认为文献中的夏代史料基本都是不可信的。顾氏对文献中的夏代记载持否定之态度，在他与童书业合写的《夏史考》（仅完成四章）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顾、童二人认为：不仅鲧、禹与夏

①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自序”，第20页。

②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6页。

③ “东周以上无史”是胡适弟子顾颉刚对乃师观点的总结，参见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45页。

④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6—17页。

⑤ 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4，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4页。

⑥ 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3，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1页。

⑦ 孙庆伟《顾颉刚夏史研究与夏文化早期探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5期。

⑧ 顾颉刚《春秋战国史讲义第一编》，《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4，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4页。

⑨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6，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18页。

无关,就连启、五观、三康、后羿、少康等夏代传说人物和故事,或是由神话转化而来,或是由早期传说分化而来,或是由后人杜撰,而其他诸王,如相大约是商祖相土的分化、杼似与越民族有相当的关系、孔甲大约是商王祖甲的分化,“至于皋、不降等,我们差不多只知道一个名字而已,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夏王,已不可知了”。<sup>①</sup> 文献中的夏代故事,基本被顾氏否定,夏史几乎全为伪史,夏代存在的根基已经基本被抽离。

可见,20 世纪 30 年代的顾颉刚对夏代的态度,具有矛盾性:承认夏,却不承认文献中的夏史。这种矛盾性是在夏代“共时性”史料缺失的前提下,顾氏把上古史传说视为中古期史料的必然结果。<sup>②</sup> 顾氏是古史辨运动的发起者,在民国疑古思潮中处于领导者的地位,他的“夏代史料怀疑论”,自然会对疑古派的其他学者有较大影响。顾氏宣布了夏代史料的不可信,已经在事实上抽离了夏代存在的根基,他的承认夏,和后来学者的否定夏,仅仅一线之隔。继顾氏而起的疑古学家,很容易在顾氏的基础上,发展出“夏代否定论”。

## 二、陈梦家、杨宽“夏代否定论”辨析

20 世纪初学术界对夏代古史记载的怀疑,已经在事实上动摇了夏代存在的根基,“夏代否定论”就是在这—学术背景下产生的。持此论者,以陈梦家和杨宽为代表。

陈梦家 1936 年发表长文《商代的神话与巫术》,<sup>③</sup>其第二章“神话传说中的历史系统”之第一部分“虞夏商为一系说”有“夏世即商世”一节,被吕思勉、童书业收录于《古史辨》(第七册)中,成为影响一时的有名观点。陈梦家认为:

《史记·夏本纪》叙禹至帝癸凡十四世,《殷本纪》叙帝桀至示癸凡十四世,窃疑夏之十四世,即商之十四世,而汤武之革命,不过亲族间之争夺而已。<sup>④</sup>

明确指出夏是由商分化出的一个朝代。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基于六点理由:1. 地理文化相同,主要引用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夏、商起源于东方的观点;2. 兄终弟及之制,文献记载夏代和商代都有兄终弟及之事;3. 治水之业,夏之禹,殷之契、冥皆有治水的事迹;4. 先妣为神媒,陈氏认为殷之简狄、夏之涂山氏都是古之神媒;5. 禹为商人之祖,主要依据传世文献和金文中的成汤居禹迹的相关事项;6. 夏、商帝王号多相重复。

陈梦家的这六条理由里,第一条不足为据。商的地理记载,主要以东土为主,商不曾在西土建都,陈氏“神话传说中的历史系统”之第二部分“商为东方民族”也赞同这一观点。但是,夏的地理记载,除了曾在东土,也有在西土者,傅斯年著名的“夷夏东西说”就建立在夏为西土民族的基础之上。即使如杨向奎、沈长云等学者所言,夏起源于东土,后迁于西土,<sup>⑤</sup>也不能以“地理文化相同”论证“夏

① 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 1,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553—611 页。

② 关于顾颉刚志愿从事“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研究,参见李扬眉《颠覆后如何重建:作为思想史家的顾颉刚及其困境》,《学术月刊》2008 年第 9 期。

③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 20 期,1936 年 12 月。此文后收入《陈梦家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2016 年版)。

④ 陈梦家《夏世即商世说》,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 7 册,海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91—692 页。

⑤ 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第 7 卷第 6、7 合期,1937 年 6 月;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 年第 3 期。

世即商世”因为这样不足以解释何以商没有迁徙西土的传说。第二条理由中,夏是否为兄终弟及,文献记载纷乱,并不能得出这一结论;而商之世系是否就是兄终弟及,至少在武丁以后,已经演化出父子相继的线索。即使夏、商都是“兄终弟及”,也可以用早期国家继承制度不发达来解释,“兄终弟及”是早期继承制度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sup>①</sup>西周时期姬姓的鲁国就曾有此制度。可见,“兄终弟及”并不能作为夏、商一系的论据。第三条理由中,如果认为夏、商都起源于东方,而东方多有水患,<sup>②</sup>夏、商两族先祖都有治水之经历,实为平常,同有治水经历并不足以证明二者为一系。第四条理由中,我们且不说涂山氏、简狄为神媒之说年代较晚,没有早于汉代的文献证据,即使如陈氏所论,其逻辑也是不能成立的。闻一多早有论述,夏、商、周三民族都以其先妣为神媒,夏之涂山氏、殷之简狄、周之姜嫄皆如此。<sup>③</sup>依陈氏逻辑,则夏、商、周三代先妣都是同一人分化。这自然是不能够成立的。第五条理由中,《诗·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叔夷鏹铭“赫赫成唐……处禹之绪”(《集成》<sup>④</sup>285)为其立论基础,陈氏认为商是禹所生。然则,类似的承天受命、处禹之迹(或作“绪”“绩”等)的记载还见于姬姓周人和嬴姓秦人身上,如《逸周书·商誓解》记载周武王追溯“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sup>⑤</sup>传世的秦公簋记载秦的先祖“受天命,鼎宅禹迹”(《集成》4315),岂非夏、商、周、秦皆为一系分化?最近出现的曾国嬭加编钟有铭“伯括受命,帅禹之绪”,<sup>⑥</sup>也可以证明《商颂·长发》与叔夷鏹铭中的相关铭文是古人承天受命的一贯说辞。

上述六条中,唯第六条理由“夏、商帝王号多相重复”实为“夏世即商世”说根基,影响较大,<sup>⑦</sup>可作详细讨论。陈梦家认为,夏、商帝王号相重合者有七条,分别是:a. 夏一誉;b. 启一契;c. 相一相土;d. 芒一冥;e. 槐一亥;f. 不降一王恒;g. 履癸一示癸。关于a,“誉”即指卜辞中的“高祖夔”,王国维以声求之,“高祖夔”即商人始祖契之父“帝誉”,陈氏则认为“夔”乃“夏”字,以此证明“夏”最初为殷人祖先之名。不过,“夔”的上古音为泥母幽韵,“夏”的上古音为匣母鱼韵,二者韵部可以旁转,但声母较远,上古音并不接近,陈氏自己后来在《殷虚卜辞综述》中也放弃这一观点,认为“夔”可能相当于少皞摯,说明以“夔”为“夏”并无坚实的证据。<sup>⑧</sup>关于b,陈氏认为“启”又作“开”,而“契”亦有开意,然“启”之作“开”,乃汉人避讳汉景帝刘启而改“启”为“开”,非“开”乃“启”之别名。“启”在夏朝为第二代帝王,“契”在商朝为第一代先公,二者在本民族中的地位并不相同,不存在“启”由“契”分化之基础。关于c,夏王相与殷先公相土虽然同有“相”名,但学术界颇多以“相土”与卜辞中“土”相对应的观点,<sup>⑨</sup>若这一观点准确,则“相土”实以“土”为名,与夏王“相”并不同名。关于d、e,在《史记·夏本纪》中,芒为槐之子;而在《史记·殷本纪》中,王亥为冥之子,芒、槐、王亥、冥四人之

① 加拿大学者布鲁斯·G. 崔格尔曾指出,在早期国家中,“王权常常采用兄终弟及或单一家庭的父死子继的方式继承”。参见布鲁斯·G. 崔格尔《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徐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

② 顾颉刚《说丘》,《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5,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8—156页。

③ 闻一多《神话与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陈、闻二人皆以涂山氏为女娲来论述涂山氏为神媒,然则《楚辞·天问》中的“女娲”和“涂山氏”为毫无关系的二人,可知涂山氏是否为女娲,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本文简称《集成》。

⑤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52页。

⑥ 郭长江、李晓杨、凡国栋、陈虎《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

⑦ 年轻学者中,李宏飞就以陈氏这一论述为基础,进一步阐述“夏世即商世”,参见李宏飞《夏商世系探索》,李雪山、郭旭东、郭胜强主编《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第331—340页。

⑧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38页。

⑨ 王国维《古史新证》,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关系正与陈氏所论相反。另外,陈氏认为槐、亥音近,槐乃亥之分化,又与殷人命名原则不符。“亥”乃殷人日名,王亥当有本名,如大乙名履、帝辛名纣之类,假如槐乃王亥的分化,也应该是从王亥本名探求,而非基于亥、槐音近。至于陈氏认为槐又作芬,王亥又作王冰,芬、冰音近,也是误解。王国维早已言之,王亥写作王冰,是因为“冰”乃“亥”之讹,<sup>①</sup>非冰乃亥的本名。关于 f,降上古音为冬韵见母,恒上古音为蒸韵匣母,声母虽然接近,但韵部较远,很难说二者上古音相近。关于 g,“履癸”虽与“示癸”皆有“癸”名,但“示癸”之“癸”为日名,而非“示癸”本名。陈氏又谓,履癸之履,亦为汤名,似认为“履癸”又从成汤之名中分化,但成汤的日名为乙,与“履癸”之癸不同。且履癸为夏末的桀,恶名颇多,成汤为代夏的第一位商王,是圣贤之王,认为夏桀由成汤分化而出,于逻辑不符。可见,陈氏“夏、商帝王号多相重复”一条,问题较多,存在臆测的成分,并不可信。实际上,仅仅因为名号中略有相同文字,就认为存在分化之可能,则不仅夏商帝王名号多相重复,商周帝王名号也多相重复,如殷之先公中有昌若、曹圉,周之先公先王中有高圉、亚圉、姬昌,是不是也能说商世即周世?

陈梦家所论“夏世即商世”的六点理由既然多不能成立,其结论“夏世即商世”自然也不可信。大约是知道这一早年观点的不成熟,陈氏后来在《殷虚卜辞综述》中有“关于夏年”一节,不仅承认夏的存在,还积极探索了夏的年代。<sup>②</sup>这说明陈氏后来已经放弃了“夏世即商世”的观点。

杨宽在 20 世纪 30 年代著有《中国上古史导论》一书,其第十篇“说夏”专门讨论夏之名号及有无问题。“说夏”第二部分“夏国族之有无问题”指出“夏代之有无,本属疑问,吾人尚无实物以明证其必有。”又谓“夏代传说之确立,至早在殷周之际。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展转演述而成者,故周人盛称之,而殷人则不知,亦无怪乎卜辞之不见其踪迹矣。”并援引顾颉刚、童书业《夏史考》为证“近顾颉刚、童书业二氏复作《夏史考》,明证夏史之皆属虚无,无不由于神话传说展转演变。夏史既出演变而成,则‘夏’之一名又安见其非演变而成乎?”<sup>③</sup>概括而言,杨氏对夏之怀疑,主要基于这样三个方面的证据:其一,文献中的夏史,“无不由于神话传说展转演变”;其二,甲骨文中没有夏代踪迹;其三,夏可能是周人为建构伐商天命观而特意杜撰的朝代。其第三点仅是逻辑推测,并无史料支撑,本文最后还会论及,此处不复赘言。

杨宽的“夏代否定论”的第一个重要支撑,是顾、童二氏的《夏史考》。《夏史考》对夏代传说的彻底否定,抽离夏代存在的根基,上文已有所论。但是,《夏史考》对夏史传说的彻底否定,论据并不充分,其结论多有可以证伪之处。比如,《夏史考》关于夏史传说层累形成体系的观点,有一个很重要的支点,就是禹与夏发生关系在战国时期,此后才有禹与启的父子关系,但这一认识无疑是有问题的。学术界普遍认为《逸周书·世俘解》是一篇可信的周初文献,<sup>④</sup>文中记载古乐名《崇禹生开》,其中“开”就是“启”,为避汉景帝讳改为“开”。《崇禹生开》就是禹娶涂山女生启之事。<sup>⑤</sup>周武王克商后奏此乐,说明此乐早已流传,禹与启发生联系远在商末之前。清华简《厚父》记载“逖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惟后,帝亦弗巩启之经德少,命咎繇下为之卿事。”<sup>⑥</sup>它清楚地

①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 9 页。

②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 213—214 页。

③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说夏》,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 7 册,第 163—164 页。

④ 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第 2 辑,1963 年 4 月;裘锡圭《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裘锡圭学术文集·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79—380 页。

⑤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第 429 页。

⑥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 5 辑,中西书局 2015 年版,第 110 页。

明禹是“建夏邦”之人,启是继承禹之人。《厚父》是早期可信的文本,也能证明禹、启、夏发生关系的时间不会晚于西周时期。<sup>①</sup>这些可信的早期史料都可以证明《夏史考》构建的夏史体系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夏史考》认为禹是由神话而为人王(此乃顾颉刚观点,顾氏关于禹的观点虽然多变,但一直坚持禹由神而人的观点),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大禹治水的神话性质。保利博物馆收藏一件西周中期豳公盨,有“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迺畴方,设征,降民监德”(《铭图》<sup>②</sup>5677)之铭,显示西周时期的大禹确实具有治水的神性,有利于大禹是由神话人物转变为人王的观点。但是,清华简《厚父》不仅有禹为夏之人王,还有“禹……川,乃降之民”的记载,正可与豳公盨对读。这说明,西周时期禹治水和禹建夏邦是并行不悖的两个传说,即神性和人王两个特征在西周时期并存于禹的身上。这样一来,《夏史考》所说大禹是由神话而为人王,至少是不符合西周材料,他很可能把两个并行的传说,或同一传说的两个特性,线性的安排为前后演进的关系。

从禹与启的关系可知,《夏史考》所建构的夏史传说层累形成体系不可轻信,这也能说明借《夏史考》以论证夏为伪史的杨宽观点之不足信。

杨宽的“夏代否定论”的第二个重要支撑,就是甲骨文中没有夏代踪迹。甲骨文中没有夏代踪迹,这里存在多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甲骨文是时王贞卜福祸的遗物,它可以详细记录掌握福祸的殷之先公先王和众多自然神灵,却未必会记载与自己非同一族属的夏之先王或夏之历史故事。甲骨卜辞不是典册性质的文书,它不记载一个已经逝去了几百年的夏代故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如,我们看东周时期的金文,除了宋国一脉,非子姓的诸侯国铜器又有几件记录过与殷商有关的历史故事?晚商与夏,正类似于东周与商的关系。甲骨金文都是特殊性质的文字材料,它所能记录的内容有很强的指向性,不能强求其中必然存在前朝旧事。

第二种解释,就是卜辞记载了与夏有关的内容,却没有被释读出来,或已经释读出来而没有被学术界认可。上文曾提到,陈梦家考证甲骨卜辞中殷之先公“夔”乃“夏”字,虽未必正确,却是一个从甲骨文中探索夏的极有意义探索。最近,蔡哲茂据清华简中《尹至》《尹诰》,指出卜辞中的“西邑”最早是夏的王都,在卜辞中已转化为夏王朝先王之亡灵,是夏王朝存在的新证。<sup>③</sup>有学者指出,蔡氏的观点可以启示我们,过去在甲骨卜辞中找不到“夏”或者误释“夏”,有可能是商人并不管夏叫“夏”。<sup>④</sup>“西邑”乃夏都说最终能否成立,尚待将来材料的检验,但它可以说,贸然认定甲骨文中一定不存在夏的证据,并不见得就一定正确。

第三种解释,目前发现的甲骨文材料只是当初埋藏于地下的材料中的一部分,过去毁坏的,或没有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应该还有很多,与夏有关的内容也可能记载在那部分甲骨文中。果若如此,那就只能期望未来的考古发现能提供更多的线索。

这三种可能的解释皆可以说明,已知甲骨文材料中没有发现“夏”,并不能成为否定夏之存在的证据。可见,杨宽否定夏代的存在,也仅仅是一种推测,并没有多少实证层面的证据。对此,顾颉刚

① 杨栋《清华简〈厚父〉所见夏代传说》,《民俗研究》2020年第1期。关于《厚父》的性质,有《夏书》《尚书》《周书》之争,但据《厚父》与商周金文、《尚书》周初“诸诰”的对比,可知《厚父》成书年代不会晚于周初。

②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简称《铭图》。

③ 蔡哲茂《夏王朝存在新证——说殷卜辞的“西邑”》,《中国文化》第44期,2016年10月。

④ 陈民镇《信史抑或伪史——夏史真伪问题的三次论争》,《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

曾评价杨氏此说“吾人虽无确据以证夏代之必有,似亦未易断言其必无也。”<sup>①</sup>足以说明杨氏此说的问题所在。杨氏后来也改变观点,认为“不能否定夏代的存在”。<sup>②</sup>

### 三、当代学者的“夏代否定论”

在陈梦家、杨宽之后,国内学术界较少有学者公开质疑夏的存在,在大家看来,夏的存在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国外学术界对夏的怀疑和否定一直没有消失。<sup>③</sup>199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上古史》第四章以“商:中国第一个历史王朝”为题,就是西方汉学界疑古倾向的集中体现。对此,编者之一的夏含夷曾说道“历史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就是确定一个比较窄的历史定义——有文字资料。没有文字资料之前,不是信史。”<sup>④</sup>这也可以为西方学者质疑夏代信史作注脚。

细究“没有文字资料之前,不是信史”,似专指狭义的文献历史学而言的,即认为没有共时性文献,就没法证明传世文献中夏代史料的真实性。这与清末民初的“上古茫昧无稽考”“东周以上无史”颇为接近,而与“夏代否定论”略有不同。对于这一观点的回应,即判断文献中夏代历史故事是否夏代真实发生的事情,似只能有待于将来发现夏代共时性文献材料,这就如对“东周以上无史”的回应,是由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的发掘来完成的一样。

把“没有文字资料之前,不是信史”往前推进一步,很容易走到“夏代否定论”上。最近几十年的“夏代否定论”也有新的进展,就是美国学者艾兰的“夏代神话说”。<sup>⑤</sup>

艾兰对夏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她在《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一书中建构了上古史传说中的“世袭”与“禅让”的结构性对立主题,夏的诸王也作为结构性矛盾中的一部分,被纳入书中。<sup>⑥</sup>在把古史系统分解为“世袭”与“禅让”两个对立的主题元素后,艾兰发现,她所归结为商的神话因素,正与夏的神话因素处于对立面,而这一对立的夏、商神话体系,在周人那里被转化为政权的更替。因此,艾兰认为,夏可能是商的神话,夏存在一个由“神话”转化为“历史”的过程。艾兰对“夏代神话说”的论述,除了早期的两篇论文,<sup>⑦</sup>更系统的论述见于《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一书。

艾兰认为,十日神话中十日由东方扶桑飞西方若木,然后通过地下河流(黄泉)回到东方,这里的东方/西方、扶桑/若木、天空/黄泉就形成了多组对立形象,艾兰把其中的东方、扶桑、天空称为商人形象,西方、若木、黄泉称为夏的形象。艾兰具体论述道:

商人的神话体系中存在一种二元对应论……在这个神话体系里,商人跟太阳、东方、生

①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导论第十篇说夏附函按》,《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612页。

② 杨宽著,贾鹏涛整理《杨宽史学讲义六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7页。

③ 本文的“国外学术界”,也包括日本学界,日本学界有不少学者对夏代表示怀疑,如落合淳思的近著《殷——中国史最古の王朝》,中央公论新社,2015年)就是这一思想的反映。不过,限于笔者学识,本文并不涉及日本学界。

④ 黄晓峰《夏含夷谈〈剑桥中国上古史〉出版二十年》。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905904 [2023-02-13]

⑤ 对艾兰“夏代神话说”的解读,参见韩鼎《从艾兰“夏代神话说”看中西方学界夏文化研究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3期。

⑥ 艾兰《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余佳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3—72页。

⑦ 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杨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3—92页;艾兰《关于“夏”的神话》,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140页。

命、天空、天界神灵相联系;夏人则跟月亮、水、龙、西方、死亡、下界、下界神灵相联系,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对应关系。当周人灭商以后,这个神话体系就在周人自己历史的语境中被重新解释了,神话成了相应的历史事件。“夏”成了一个先前的政治王朝。到后来,跟“夏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原来下界黄泉神祇“黄帝”,也就演化成历史上的帝王了。在历史传统的次序里,黄帝跟他的后代颡顛被放到了尧(上帝的变形)的前面。总的说来,那些从黄帝到夏代的历史记载,都可以看作是从商代神话体系中演变发展而来的。<sup>①</sup>

可以看出,艾兰的夏为神话观中,既延续了古史辨运动期间“夏代怀疑论”的某些论断,如夏最后成为历史王朝,是周人为了建构合法性而杜撰的,这与杨宽的观点如出一辙;也有自己的发明,认为夏本是商人的一种神话,这是过去没有人说过的,是她论证的重点。

在艾兰的论述中,最关键的地方是确定月亮、若水、龙、西方、死亡、下界(黄泉)等形象,是夏的特征。这些特征中,有些较容易与夏发生关联,如水生物(龙、龟)、西方、若水等,在文献中与夏的关系密切。月亮、死亡、黄泉等意象,则与夏的关系并不密切。艾兰通过夏的始祖黄帝,把黄泉与夏建立起联系,认为黄帝是黄泉之神,是地下神祇。但是,罗新慧已经指出,文献材料并不支持黄帝是由地下神祇演变而来的结论,黄帝不能被视为黄泉之神,而且黄帝也不仅仅是夏族的始祖,《史记·殷本纪》还记载黄帝是商人始祖帝喾的祖父。<sup>②</sup>实际上,黄帝不仅是夏、商两族的始祖,也是周人的始祖,《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祖先后稷也是帝喾之子。这里就出现了颇为有趣的现象:夏商周虽都是黄帝之后,但三族亲属不同,夏禹为颡顛的后裔,而商契、周稷都为帝喾的后裔。如果艾兰所说可信,即夏、商是二元对立的两种意象,周人伐商后又积极以各种意象来表达对商的对抗和取代,那么自称“有夏”的周人最容易选择与夏有相同的祖先谱系,即都是颡顛的后裔,但文献中却恰恰相反。这足以证明,以黄帝为媒介,来把夏与黄泉建立联系,并不是好的选择。

关于夏与商、黄泉与天空的对立,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可以提供一个反证。岳洪彬发现殷墟王陵区大墓墓穴(尤其腰坑)的深度均穿透当时的地下水,达到“下及黄泉”的效果,体现了商人的黄泉观念。<sup>③</sup>若这一成果可信,则说明商人也流行黄泉的观念,黄泉不能被视为夏所独有的文化因素。

从文献角度看,艾兰所列举的夏、商二元论意象也有颇多不合适之处。艾兰把太阳归为商人意象,把月亮归为夏人意象,从而把夏与太阳割裂开来,这其实是有问题的。首先,颡顛是夏的祖先,颡顛也称高阳氏,表现出对太阳的崇拜。其次,在周人的文献记载中,后羿射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神话,艾兰把这一神话解释为周人杜撰后羿射日来对抗商人的十日传统,但问题是后羿往往被认为是代夏的人物,是早夏的终结者,而非商的敌人。如果按照艾兰的“后羿射日”蕴含了族群对立、政治鼎革的隐喻,那么后羿所射之“日”,只能被认为是夏的形象。也就是说,无论从颡顛为高阳氏出发,还是从后羿射日神话出发,夏与太阳都是有关联的。

而且,夏的神话也不是与天空、天庭彻底无关的。《山海经》中“大荒西经”和“海外西经”记载夏启“御龙登天”之事,郭璞注引《归藏·郑母经》“夏后启筮御飞龙登于天”,<sup>④</sup>说明神话中的夏与天的

① 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增订版),汪涛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4页。

② 罗新慧《十日神话:结构主义的诠释——评〈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

③ 岳洪彬《再论商代的“黄泉观念”——从殷墟王陵和水井深度的比较得来的启示》,《中原文物》2018年第5期。

④ 郭璞注《宋本山海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页。

关系也很密切。

可见,艾兰通过十日神话,强行把夏、商归纳为神话体系中的二元对立,把夏看作商人的神话,既与现有文献、考古成果不符,也不能做到逻辑自洽,因而无法成立。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国内的部分学者也持“夏代否定论”,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为考古学家陈淳。陈淳的一系列论文也都认为夏可能是周人杜撰的朝代。<sup>①</sup> 这些论文颇有影响力,甚至一度引起学术论战。<sup>②</sup> 但是,陈淳的理由,除了指责国内学者带有主观立场论证夏的存在外,主要还是引用古史辨运动时期顾颉刚、陈梦家、杨宽等人的论述。也就是说,陈淳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新的论述,加之已有不少学者专文反驳陈淳的观点,所以本文就不再过多讨论。

#### 四、夏代不是周人杜撰的新证

如前所述,自 20 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夏代信史的否定,除了没有共时性文字材料、甲骨文辞没有记载夏外,最为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想当然地认为夏代是周人代商过程中,为了构建自己的合法性,杜撰而来。对于这一观点,上文所举朱凤瀚、张国硕、沈长云等学者已经辩驳,尤其是朱凤瀚,从《尚书》中可信的周初史料(如《多士》《多方》《召诰》诸篇)入手,论证商末周初的周人、殷人都知道夏的存在,夏的故事是当时社会一般人都知道的历史背景,颇令人信服。试想,周公当着大量“殷先人有册有典”的殷遗民宣传一个不存在的朝代,且让殷遗民也认同这一朝代,委实匪夷所思。凭借这样虚假的宣传,周公如何自信能够建立起属于周王朝的天命观? 其中不合情理之处一目了然。

除了上述诸位学者的分析,本文还可以根据清华简公布的几篇新材料,补《尚书》之不足,以论证夏不是周人杜撰的朝代。

清华简《四告》是四组告辞,其第一组告辞乃周公告皋陶,可与《立政》《吕刑》对读,乃周初文献。<sup>③</sup> 周公称颂皋陶事迹,谓“夏用配天”,明确指出皋陶是夏代之神。有学者指出,皋陶是东夷族人,周公被封于鲁,因此特意告祭皋陶,求得皋陶之配合。<sup>④</sup> 如果夏本不存在,周公何必给皋陶安上一个“夏用配天”的头衔? 这岂不给皋陶在鲁地配合周人增加了一个本不必要存在的门槛? 而且,周人祈祷神灵,本是极为虔诚的事情,故意杜撰皋陶“夏用配天”之事,实是对神灵的大不敬。这在逻辑上无法说通。

前举清华简《厚父》是逸《尚书》之一,文辞古奥,多有可以与商周金文和周初“书”篇对读之处,学者多认为《厚父》为早期文献。<sup>⑤</sup> 《厚父》记载非常丰富的夏代历史故事,如禹建夏邦,皋陶为夏启卿事、孔甲为哲王、节制饮酒等。其中,皋陶故事可与《四告》(一)皋陶“夏用配天”对读,说明皋陶为夏之卿事是周人(周公)、夏后裔(厚父)都熟知的历史故事,证明《厚父》所载夏之历史故事是西周时期共享的历史传说。这就说明,西周时期的人们并非仅仅知道“殷革夏命”,他们对夏的了解已经极

① 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陈淳《科学方法、文明探源与夏代信史之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② 对陈淳的回应文章,主要参见沈长云《夏代是杜撰的吗——与陈淳先生商榷》,《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杜勇《关于历史上是否存在夏朝的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张国硕《“周代杜撰夏王朝说”考辨》,《中原文物》2010年第3期;张国硕《论夏王朝存在的依据》,《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4期;张国硕《试析“夏王朝否定说”形成的原因》,《华夏考古》2010年第4期。

③ 赵平安《清华简《四告》的文本形态及其意义》,《文物》2020年第9期。

④ 程浩《清华简《四告》的性质与结构》,《出土文献》2020年第3期。

⑤ 赵平安《〈厚父〉的性质及其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文物》2014年第12期。

为丰富夏的建立、发展、灭亡的整个历史故事已经存在。这种丰富的历史系统,必然不是周人凭借一己之力在短时间内能够建立的,需要有源远的形成历史。

清华简《传说之命》三篇是殷高宗武丁对臣子傅说的命书,记载了武丁得傅说的过程以及对他的训诫,其中篇有“故我先王灭夏”之句,<sup>①</sup>记载了武丁述商汤灭夏事,极为重要。《传说之命》文辞古奥,虽在传抄过程中受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影响,仍多有可以与《尚书·盘庚》和甲骨卜辞对读的地方。比如,李学勤指出上篇“我其杀之/我其已,勿杀”与殷墟卜辞格式一致,认为《传说之命》包含了商代以下很难拟作的内涵,其价值可与《盘庚》相提并论。<sup>②</sup>付强对比了《传说之命》与宾组卜辞用例,认为清华简《传说之命》的用词和用字习惯与商周时期的语言实录有非常多的相合之处,只有一小部分的润色与加工,基本上可以证明清华简《说命》确实为武丁时期的一篇实录。<sup>③</sup>可见,《传说之命》是较为可信的《尚书》逸篇。《传说之命》记载了商汤灭夏之事,说明此事在武丁时期已经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背景之一,不会是晚到周代才被创造出来。

因此,无论是传世的《尚书》中诸可信文献,还是新出的清华简《四告》《厚父》《传说之命》,皆可证明,夏代不仅不会是周人杜撰的,而且早在晚商时期就已存在于商人的历史观念中。这就抽掉了“夏代否定论”最后一根支柱。

## 结 论

本文系统回顾了20世纪以来“夏代怀疑论”的兴起与发展过程。“夏代怀疑论”最初以“夏代史料怀疑论”的形式存在,它在清末民初时期逐渐发展为一种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观点,并被顾颉刚等学者所继承和阐释。《夏史考》对夏代史料进行了系统的质疑,抽空了夏代信史的基础,进而产生了陈梦家、杨宽的“夏代否定论”。新中国成立后,直至20世纪末,国内学术界基本视“夏代否定论”为无稽之谈,并没有给予认真的对待,自然也就没有系统地加以驳斥。但是,陈梦家、杨宽的“夏代否定论”在国外却一直有着较大的影响,艾兰的“夏代神话说”既是她用结构主义解读中国上古史料的结果,也有早期“夏代否定论”(尤其是杨宽的观点)的一些影子。于是,在21世纪初,“夏代否定论”在国内再度复活。

本文不仅梳理了“夏代怀疑论”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也对“夏代怀疑论”,尤其是“夏代否定论”的代表性学说,如陈梦家、杨宽、艾兰的观点,加以系统的辨析,并补充了夏代不是周人杜撰的新证。笔者认为,持“夏代否定论”的学者并没有实质的证据证明文献中的夏是不存在的,更无法证明夏是周人杜撰出来的朝代。这固然不能彻底证明夏代曾存在,但夏代存在于商周人的历史观念中的事实,对于进一步证明夏代信史说是有利的。

(作者王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100101)

(责任编辑:敖 凯)

(责任校对:尹媛萍)

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3辑,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25页。

② 李学勤《论清华简〈说命〉中的卜辞》,《华夏文化论坛》第8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274页。

③ 付强《从宾组卜辞看清华简〈说命〉的用词》,转引自程浩《清华简〈说命〉研究三题》,《古代文明》2014年第3期。

**On the Climate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Yuanyou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Yan Yongcheng*

The unique climate of historical studies is often reflec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ertain political , intellectual and even soci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of a specific era. It is also shap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real politics , intellectual ideas , and scholarly interests of the time. During the period of Yuanyou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 the unique political situation had a direct impact o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by official and private historians alike. Not only did they inherit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from the Ren-Zong period , but also they promoted the pursuit of individual scholarly interest. Furthermore , numerous bureaucratic literati chronicled historical records for pragmatic purposes , as a way to consolidate their social network. It strengthened the functionality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Hence , the climate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Yuanyou period was no doubt a consequence of blended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 academia , and scholarly interests , leaving a lasting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

**Historical Writings on the Han-Song Regim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 *Zhou Zhongliang*

The early Ming government concealed Zhu Yuanzhang 's claim of vassalage to the Han-Song regime and attempted to suppress the social memory of this event. They also depreciated the status of the Han-Song in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s. The official record in *Xu Zizhi Tongjian Gangmu* during the Chenghua period treated the Han-Song regime with higher status for the purpose to downgrade the orthodox status of the Yuan dynasty. By the mid-and-late Ming period , private historiography began to focus on the Han-Song regime due to the resurgence of Longfeng documents. Historians differed in their views on whether Zhu Yuanzhang once adopted the Longfeng era name and received official titles designated by the Han-Song regime. Most mid-and-late Ming historians acknowledged the Han-Song 's achievements against the Yuan court but defended Zhu Yuanzhang 's reputation by praising his loyalty and denying Han Lin 'er 's status as a monarch.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Han-Song regime was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official manipulation of memory , loosening of imperial control , and tensions in Mongolian-Han Chinese relations , which reflected the complexity of ancient Chinese orthodox views.

**A Refutation of the “Xia Dynasty Skepticism”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 *Wang Qi*

There has not been a consensu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whether the Xia was a historic dynasty. Scholars cannot even agree on whether it ever existe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the “Xia Dynasty Skepticism” has undergone a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questioning the credibilit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the dynasty to doubting its very existence. Gu Jiegang was a key figure. Chen Mengjia and Yang Kuan invented the “Xia Dynasty Denial Theory” , and Sarah Allan further developed it into the “The Myth of the Xia Dynasty”. But these views are either lack of solid historical support or logical contradictions. They cannot prove that the Xia dynasty did not exist. Moreover , newly emerg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once again confirm the existence of the Xia proving that it was not a dynasty forged by the Zhou people.

**Rethinking the Critical Developments in Studies of the Commemorativ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Li Junquan*

As a subject of scholarly inquiry , studies of the commemorative history of the CPC have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However , scholars still face challenges due to limitations of some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s. Some of them seem to overstress the political nature for commemoration days for the Party , underestimating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sociality for the people. Therefore , it will be an effective way to bring back the social time to studies of this topic. In other words , to overcome this challenge , scholars need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 the dynamic transformation of commemoration days from political time to public social time in their studies. They need to explore the political rationale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s social construction centered on the celebration of commemorative days.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this approach is that it presents the ideological cognitions , political attitudes , public emotions and actions of the public in commemorative politics. It restores the historical pattern of mutual support and struggle among the Party , the government , the people , and various social forces on commemorative days.